

导 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文化史乃是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融会贯通的历史。如果将日本自身文化称为“母体”的话，那么外来文化则是它的“父体”。如果仅有“母体”而无“父体”则不会有构成今日之景观的日本文化，而仅有“父体”而无“母体”则也不会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形成。因此，作为日本文化重要组成的两个部分，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两者缺一不可。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汉文化一边倒、西欧文化一边倒，也曾出现过国风文化热、国粹主义风潮，但经过反复磨合，日本文化的最终选择则是去除两端极端化倾向，建立了一种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发展模式，即“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的内外结合的文化模式。本书通过探讨日本列岛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模式，层层剖析日本文化的构架，从而展示了其社会历史的变迁。

众所周知，中国盛唐时代，日本即酣畅淋漓地引进中国文化。近代在西洋文明压境的情势下，日本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地开国，接纳了西洋文明。二战以后，更是如法炮制地嫁接了美国文化。此外，还有一段多为人们所忽略的一段历史。

即早在公元前 3 世纪绳纹末期，日本就不仅大量吸取了大陆农耕文明而且大量接纳了大陆迁徙而至的外来人种，迎来了日本历史上的“渡来人时代”。作为先进文明代表的渡来人的流入，帮助了日本列岛的开发与建设，使日本历史飞跃般地进入弥生时代。至今，日本人的血液中还流淌着大陆人的血。

由是观之，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曾有过四次高潮。笔者正是从这四次高潮出发，从三个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文学艺术及生活方式层面着手，来探讨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揭示了日本文化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在文化传播中，正如武安隆先生所言，精神层面是较难渗透的一个文化层面。所谓的精神理念，主要指人们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自然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统一的社会价值理念体系，它体现着某种特殊的文化性格，因此，一般外来文化理念很难左右或彻底改变它的存在。如，神道教可谓日本本土生长的民族宗教，它是建立在日本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原始神道教赋予日本人自然本位与现世本位的本土思想。在日本古代史上，具有现世思想的日本人在接受外来充溢着来世思想的佛教时，则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排佛”与“援佛”之争。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纷争之后，日本才最终将外来佛教融合到自身文化之中。“本地垂迹说”即是外来神与日本神融合的明证，但另一方面，佛教来世观也并未同化日本人的现世思想。外来儒教进入日本，并未彻底改变日本既有的文化理念，而是做出了相应的变形，从而形成以神道教精神为核心，又融合了儒、佛二教的“三教合一”的日本独特的武士文化。概言之，一个民族所固有的精神或理念是最难改变的，处于最高层次的文化，但其一旦改变，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将是巨大的。西方新教伦理理念被西方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之源，认为它影响和推动了资本主

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处于精神和生活方式两种文化层中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等这一文化层次 相对精神层面而言，是较容易引进的。它一般通过日本统治者自上而下地照搬 如唐代和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导入与执行 其对于日本社会历史的影响与作用也是巨大的。处于文化最低层次 的物质与生活方式、文学艺术层次的文化则是最容易引进与吸收的。如中国唐代精美的瓷器、美味的食品、雍容华贵的服饰乃至汉诗、唐乐等 则最容易吸收 并很快为日本人所“效尤”。

日本人的心理面貌，正如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心理面貌一样，是在往昔的历史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往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使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这里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与性格正是在日本特有的历史与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并且日本文化的这种继承性表现得更为显著。日本的早期文化性格在日后的“唐风”、“西风”、“美风”等八面来风之中 始终未迷失自我 而是保持着自始至终的一贯性。笔者将此称为“日本的深层文化”它是日本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的结果。自远古时代以来 岛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在相互协作、共同劳动中形成了生命一体感意识 在自然美景的陶冶中 以及神道教亲近自然理念的支配下，形成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情愫及现世主义文化性格；独特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勤勉劳作的精农主义性格；

① 《马克思全集》第 20 卷 第 38~39 页。

早期的性崇拜衍生了独特的性观念与人伦伦理。可以说，日本人早期的文化性格贯穿于日本文化历史的始终。

距今 1 万年左右，作为日本文化母体的绳纹文化开始形成。虽然它带有某种未开化的、落后的、非理性的文化特征，但绳纹人在采集、狩猎等共同劳动中形成了勤劳及相互协作的生命一体感意识，并且显露出充满活力的、乐观向上的生命追求。从时间上看，日本绳纹时代与同期大陆的仰韶文化相去不远。但自此以后，日本则与中国大陆文化拉开了距离，大陆文化变得日益精彩，而日本却一直停留在绳纹文化之中踟蹰不前。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儒学开始形成并走向繁荣，而日本尚处于理性未开化的蒙昧状态。直至公元前二三世纪，由于大陆渡来人的大量迁徙、流入，才带来日本历史飞跃性发展，日本步入了弥生时代。此时期，不仅大陆农耕文明被吸收，而且日本人种与外来大陆人种得以交融。因此，所谓的日本“单一民族论”“纯属子虚乌有之说”。渡来人是最早期日本文化的恩人。但即使是如此，日本也始终是以深层的绳纹精神来接纳大陆文化，从而使日本母体文化更加充盈，不断走向成熟，即形成所谓的“绳魂弥才”的文化模式。这便是日本文化形散而神不散的特质所在。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引进“弥才”的过程中尝尽了甜头，从而造就了其对外来文化善于吸收与开放的文化性格，强化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敏感性与动的、灵活应对的文化性格。应该说，在儒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文化一直处于非理性时期，表现为对人伦关系、天地宇宙尚未展开系统的理性思索，尚无统一的道德理念，仍处于男女乱伦、长幼无序等非道德感状态。

中世纪，儒教与佛教的导入，使日本步入了文明社会，使日本历史从相对愚昧状态走向全面开化时代，从而迎来了日

本文化的理性时期。但日本对儒教与佛教的吸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日本民族特质而有所选择，并加以相应的变形。如抛弃中国儒学“仁”本位，置换为无条件的“忠”。同时，将中国儒教中从来就不强调的“勇敢”作为重要美德。中国儒教将“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并且以“仁”为最本质的美德，强调“以德治国”、“杀身以成仁”，而日本的儒教却忽略“仁”，强调“忠诚”与“勇敢”，并以忠诚、勇敢、礼仪、节俭、信义为日本儒教的五大美德。又如，中国伦理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敬”，但日本则形成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观，而且更加现实，更加富于感情色彩。日本儒学者认为：“诚乃古今人情不得已之谓也，诚乃尽心朴实行去。”王家骅先生对此解释说，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是“诚”，将自己内心真诚的情感付诸行动是“诚”。因此，父子之情、男女情欲同样是人“不得已”之情，也就是“诚”。由此可见，日本的“诚”与中国的“敬”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理念有着较大的不同。古代日本人对于浪漫的恋爱与性爱，并不采取克制的态度，而是容纳和接受，所以日本的伦理观极富感情色彩，人情味十足，较少禁欲主义色彩。也就是说，日本是结合本民族特性对儒学加以择取吸收的。此外，佛教传入日本后，也由印度的重“来世”转变为适于日本本土的重“现世”，使佛教世俗化、实用化，紧紧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甚至僧侣在日本都具有半僧半俗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日本色彩。镰仓时代起，日本开始引进禅宗。禅宗本源自中国，然而它在中国所涉及的面很窄，仅用于将诗禅化；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比中国人走得更远。在日本，禅宗早已走出寺院禅房，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学艺术领域，无不带有禅的色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

禅”文化体系，此不能不视为日本之伟大创举，从而构筑了东方文化史上独具魅力的文化景观。总之，外来文化进入日本后，都深深地打上了日本的烙印，经历了日本化变形，即日本人是“以‘和魂’来采‘汉才’”既吸收融合了汉文化，又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色。

平安时代以来，随着日本社会步入理性时代，富有日本特色的“和风文化”亦开始形成，并逐步走向繁荣与成熟，形成一己独特的风格。其表现在文学上，和歌、物语文学已有很高成就。成书于 11 世纪的《源氏物语》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及欧洲最早的长篇小说《十日谈》早 300 年，比《红楼梦》要早 900 年，因此，有人称它为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长篇写实小说。其中内含“哀”与“艳”相结合的日本传统文学之美。同时，在生活方式上日本的“和服”、“和室”、“和食”等民俗文化及能乐、歌舞伎等日本艺能也愈益显露出日本文化的特色。进入武士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在神道教文化基础上吸取并改制了儒、佛文化，从而形成了日本色彩的“武士文化”。武士文化作为日本人的核心理念与行为准则，不仅于中世纪、近代，甚至直至今天，也对日本人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产生着影响。已日本化了的儒教与佛教理念成为日本“和魂”的重要组件之一。由此可见，“绳魂”或“和魂”均在导入外来文化之中不断得以充盈、完善，但在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整合之中，日本文化自身终究又未否定自我，而是保持着日本文化自始至终的主体性，形成了“和魂汉才”的文化模式。

步入近代，日本文化在面临西洋文明的挑战之时再一次发挥了其灵活应对的特长。在对西洋文明的别择中，最终打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和魂洋才”的旗帜。近代日本文化在转型过程中，首先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近代西洋

精神与文化，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再造，从而形成一套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理念体系；其次，在政治上建立起西方内阁制与传统天皇制杂糅的政治体制；再次，经济上积极移植西方的经济体制，但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地主制，思想上仍残留着天皇神话。此外，在文学艺术及生活方式方面也进一步“和洋折衷”化，从而形成一种介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中间型文化。

二战之后，日本又开始了向美国模式的转型。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当局在日推行民主化改革，清除了近代以来残留的封建毒素。某种意义可以说，战后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补课，彻底完成了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日本社会的完全近代化。一时间，美国的实用主义乃至爵士乐、摇滚乐、牛仔服等美国文化冲击波波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战后日本社会的价值观走入多元化，生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随着“科技立国”方策的实施，日本很快步入后工业社会，与此相伴，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也风行日本。不可否认，在西方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文化诱导下，日本社会价值观念也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战后新兴宗教倍受青睐，大有兴盛之势。在“西风”、“美风”四面来风之中，日本人仍未放弃融合内外文化的一贯传统，走出了“和魂美才”的发展模式，倡导国民仍固守本民族的良风美俗，保持日本文化古色古香的韵味。可以看到，在现代日本，一方面是欧美式的摩天大楼，另一方面则是古味十足的茶道、花道、和服、相扑的长盛不衰；一方面是全方位地引进欧美先进的文化理念与体制，另一方面，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也并未完全刷新日本传统的人伦关系结构，而是建立起一种被日本社会学家称为“间人主义”、“间柄主义”、“柔软的个人主义”的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日本所

特有的人际关系结构。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有着强大的“抗水土流失性”无论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都要接受日本批判性的吸收，都要经历日本化才能得以生存、发展，这便是日本文化能自始至终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原因所在。

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日本人自信心倍增。80年代中期起，随着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日本经济展开了全球出击。购买好莱坞影视娱乐中心，购得加利福尼亚的佩宝海滩等，日本于欧美世界大展雄风，同时，日本禅、茶道、花道以及日本文化制品等也纷纷走出国门，大放异彩。时至今日，似乎日本已进入无须学习外来文化，而是向世界输出日本文化的“和魂和才”时代了。日本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起来，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再度猖獗，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战争罪责，莫非日本历史要再度陷入历史轮回的恶性循环之中吗？

正当日本人利令智昏、头脑发胀之际，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犹如当头一棒，击碎了日本国不可摧毁的神话。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特别是金融体制的严重弊病，造成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从而带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时间，日本人一改泡沫经济时代的无止境的出国观光潮与无限制的消费风，开始勒紧腰带，节衣缩食。直至今日，日本人的消费指数仍低迷不振，致使日本银行加息计划一再搁置，终不能“定案”，学界也一改过去盛赞日本经营模式之风，甚至提出日本模式已终结之说。专家认为，日本若不在根本的经济结构与经济体制上做大手术，则难以走出困境。日本经济走出泥潭需要三年，抑或是更多年，人们将拭目以待。

第一章 日本原生文化

提起日本文化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它不过是先借鉴了东方文化，而后再融会了西洋文化而成。研究日本史的人往往也是过多地着笔于日本吸收东方文化以后的那段历史，认为日本的史前文明没什么可谈。而笔者以为，构成今日日本文化模式的内在根据恰恰存在于其史前文明之中，即以“绳纹人”(原日本人)为主体的“绳纹文化”乃是日本文化的母体，之后经过漫长的变迁，与作为父体的外来文化及人种多次的交融，才形成了今天日本所特有的文化。虽然史前文明中的“日本像”显露出早期的、未开化与半开化的、非理性的文化特征，但其中却沉潜着未来日本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与积极因素，这种内驱力正是推动日本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绳纹文化中的“日本像”

绳纹文化是因绳纹时代出土了带有草绳样花纹的陶器，故该时代以“绳纹”这一文化符号而命名。本节拟从绳纹人的起源、绳纹农耕及陶器、原始宗教意识等诸方面来捕捉和勾勒绳纹文化中的“日本像”。

混合民族说

地质研究资料表明，日本列岛是经过漫长的地质运动而形成的。现今的日本一带，原是一片无际的汪洋，并无陆地。约从 2600 万年前开始，日本一带的海底徐徐隆起，逐渐出现了陆地。从大量的动植物遗迹可知，当时的日本是与亚洲大陆连接在一起的是亚洲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中的半岛，日本海则是陆地环抱的一个内湖。

一般认为自 200 万年前开始至约 1 万年前为止，地球处于冰河时代。冰河时代又可分为气候严寒的冰期与气候较暖的间冰期，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据学者研究，冰河时代日本列岛平均温度均比现在低 6 度左右。由于日本地靠海洋暖流，因此即使是在冰期，低地地带也是植物繁茂，绿林丛生。如此良好的环境是吸引亚洲大陆的动物与原始人类大规模迁徙的动因。考古发掘表明，在冰河时期确实有大群的大陆动物经陆桥来到日本。中国华北地区的泥河湾动物群、南方万县动物群、中国周口店及北欧和西伯利亚等地部分动物群纷纷进入日本。这些动物是当时大陆原始人追捕的对象。因此，随着动物群的迁徙，一些大陆原始人也在追逐中进入日本。当今的考古发现证实，在 10~20 万年以前，日本列岛上

确实有原始人类存在。1931年明石人遗骨被发现后，葛生人、圣岳人、牛川人、三日人、兵北人、港川人相继被发现。迄今日本旧石器时代遗址已近1000处，这些原始人类与中国大陆的原始人类有着密切关系。

据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日本化石人的来源是多方面的，至少从南北两方面来到日本列岛。据考证，旧石器时代日本人有可能是中国北方北京猿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里徒步经由朝鲜来到日本。日本学者芹泽长介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缩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的类型。^①中国学者贾兰坡认为，新石器时代日本人的下鄂骨具有中国猿人“下鄂圆枕”的特点，日本学者长谷部言人则主张日本化石人是华南化石人的一支。今村丰还对华南地区的现住民进行过生物体测定，结果表明其在数值上与现代日本人很接近，特别是头形指数与华南人很近似。因而有人大胆设想，现代日本人和现代华南人都是华南化石人的后裔。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亚洲大陆的蒙古人种自南北两个方面迁徙到日本，形成上述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大约1.5万年前开始，由于地球转暖，海面上升，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相继出现，从而使日本与大陆的陆地联接被割断，形成今日的弧状日本列岛。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一般认为，绳纹时代的人是在锁国状态下发展的，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千具绳纹人的遗骨，从体质特征来看，绳纹人普遍体型矮，男性156

（日）芹泽长介：《古代史发掘》Ⅱ，讲谈社1974年版，第116页。

厘米 女性 144 厘米左右)脸型短、鼻扁平 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

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大陆移民进入日本。至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考证 在弥生文化前期 比绳纹人身材高大 平均约 162~163 厘米 的大概来自朝鲜的人种急剧进入了北九州地区 但一般认为其对绳纹人影响不大,并未因此而改变绳纹人的身高。^①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为数不少的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的大陆移民迁入日本 最初进入本州西端和北九州 以后逐渐向东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日本人混血。持“混血说”的学者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便持此论。他认为移民过程自弥生初期的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止 经历近千年 日本接受了 100 万左右的大陆人种。^②弥生时代之后的古坟时代,大陆移民仍不断地进入日本 且继续东扩 原日本人与大陆移民混血的深度与广度均进一步加大。

日本考古学家樋口清之在谈到日本人外部特征时曾说,“十分之八的日本人单眼皮并微呈浮肿 从泪腺到外眼角有一条叫‘蒙古褶’的横线”在体型上 日本人“多属于包括福建、广东等中国南部和越南等国在内的马来体型”。^③樋口清

参见(日)樋口隆康:《日本人从何处而来》,蔡凤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4 页。

参见(日)樋口隆康:《日本人从何处而来》,第 398 页。

参见(日)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王彦良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4、15 页。

之还进一步指出：“南北两方渡来的朝鲜、阿依努、马来、印尼等人种相互混合与尚未充分完成的混血，便构成了今天的日本人。”^②从体质结构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经过高度混血的“复合民族”。

此外，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亦进一步佐证了“混合民族说”。有的学者认为，日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土耳其、准葛斯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法语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其语句构成顺序均为“主语—宾语—谓语”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因此，日本民族在入种血缘关系上，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联系。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日语与南岛语系琉球岛及南洋群岛一带也有某种亲缘关系。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语视为“混合语”，即日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王家骅先生进一步阐释道，早在绳纹时代以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可能存在一种“原东北亚语”，而且中国长江下游的吴语、越语也有可能传入日本。有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语言。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更为强烈。可见，日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由此也佐证了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与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成的混合民族之说。目前，混合民族

如阿依努人逐渐北移，形成位于日本北方的独立民族。至今尚有 18300 余人，40% 从事渔、农、林业，低收入多，没有文字，但口头文学流传《优卡拉》叙事诗，居于库页岛、千岛、北海道部分地区。今流入东京、札幌内地的越来越多。其身体强悍，多毛发。

参见日 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第 142 页。

说仍为学界主流。

绳纹中期农耕说

中日史学界一般认为，稻作农耕是于绳纹时代末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不过最近一般倾向于“华中说”即由长江下游经东海传入朝鲜和日本。在日本，首先传入北九州的北端从战后发现的板付^①、登吕两大水田遗址看，当时的水田很有规划，有较完善的灌溉系统，显示出较高的生产水平。目前史学界关于绳纹末期农耕说似乎已成定论。

有些日本学者对绳纹末期农耕说提出异议，认为日本农耕始于绳纹中期，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樋口清之。他认为绳纹中期日本人定居性很强，制造出的陶器很大、很笨重，不便移动。而且若要维系长期的定居生活，仅靠采集、狩猎、捕鱼，是不能为绳纹人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的，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已出现了农耕以补充天然食物之不足。此外，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大量增多的挖土工具及用于碾压植物果实的石碾的发现，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测。樋口还进一步提出证据，从栃木县西那须野的古迹中，发现了大量成层的碳化了的石器时代的稗子，且还从琦玉县挖出了块状的碳化谷子。在信州发现了一种呈饼干状、未烧透的碳化物。^②1994年3月，清心女子大学高桥護发表了发掘报告，从冈山县姬笹原遗址出土的绳纹中期约4500年前土器片上，检出了稻叶、稻壳的细胞化石。这意味着把至今已成定论的稻作起源于北部九州唐

二战后，考古学家在板付水田遗址中发现了印在陶器上的稻痕和100多粒炭化米，时间确定为绳纹末期。

(日)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第74~75页。

津菜畑的纪元前 900 年，一下子提早了 1500 年。引人注意的是这种稻不是野生稻，而是栽培稻。但它究竟是陆稻还是水稻 由何而来 尚不清楚。高桥进而推测 从绳纹中期至晚期，有少数习惯于农作的人从海外流入日本列岛，但大规模流入则是在绳纹末期。

从以上绳纹中期农作物遗迹看，并不能否认绳纹中期农耕的出现。但笔者以为 绳纹中期农耕只是“星星之火”并未形成“燎原之势”因此并不普遍 真正在日本列岛普及推广开来的，仍是大批大陆人涌入日本列岛的绳纹末期。当时的农耕作物 除稻米外 还包括稗、高粱、苞谷、粟和蔬菜。

樋口清之还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及颇富想像力的文学家的笔触，极为生动地勾勒了石器时代日本人的饮食状况：“虽不像东南亚那样有种类繁多的野生薯芋类食物 但有丰富的佛掌薯、山芋、葛根等根茎类食物。”在日本出土的贝壳“其种类竟多达近二百 还有现代人不常吃的贝”，仅一个部落就曾吃过数百种动物”。^① 据说在本州冈山县赤磐郡山阳町前池遗迹中 还出土了不下十个之多的地窑 其中有无数的榧、栗、榛之类的硬壳果，且那些硬壳果竟达四十类石之多。如此之多的贮藏量，显然是备不足之需的余粮。^② 此外 当时的绳纹人还靠丰富而有效的天惠来御寒和遮羞，其中最重要的是兽皮和鱼皮。绳纹时代鹿的数量不可胜数 鹿肉不但可食 且还可供当时人御寒遮羞 鲑肉鲜美 营养丰富 且久食还可增加体温。樋口认为，当时的日本人之所以能不像吉普赛人那样

（日）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第 44、45 页。

^② 参见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66 页。

四方漂泊 比较稳定地长期安居在一起 就是因为当时粮食充裕。石器时代 日本人口所以稠密到世界第一的程度 可以说也是由于这一原因。^① 由此看来 日本能有多种多样的可食植物、动物、鱼类 可谓一大天幸。与此同时 伴随着绳纹时代农耕文化的普及化，作为其文化载体的日本人的农耕性格也相应形成。

绳纹陶器

自古中国就是陶艺的故乡。但到了现代，日本则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笔者曾在三重县造访过一家“濑户烧”^② 专卖店 在那里摆放着造型各异的各式陶器 精致而典雅 无不堪称艺术之作，比之中国河南唐三彩更映衬出日本特色。

寻根溯源，日本陶瓷的历史可上溯至绳纹初期的陶器。日本最早的陶器，始见于今天爱媛县的久万川彼岸的上黑岩洞穴。在这个石灰岩遗迹中，发现了距今 1.2 万年的细隆纹陶器、距今 1 万年的无纹陶器及距今约 8000 年的带有押线纹装饰的陶器。^③ 绳纹前期陶器多为尖底钵，中期以后趋向平底深钵，后期和晚期的造型则富于变化。绳纹时代陶器色彩多为深褐色或红褐色，表面图案基调为绳纹式花纹。绳纹陶器具体分为押型纹、贝壳纹、隆线纹、瓜型纹等 比之弥生陶器 表现出较强的装饰性。绳纹晚期 日本东北地方还出现了

(日)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第 44～45 页。

^② 日本人一般称陶器为陶瓷或“濑户烧”，因制作地在爱知县的濑户附近，因此而得名。此地自古即以陶器生产闻名于世。

(日)三板辉弥：《古代史发掘(2)》，讲谈社 1973 年版 第 23～24 页。

称为‘精制土器’的黑陶器，特点是陶胎薄而轻，呈铁黑色，造型优美，具有一定的艺术观赏性。

比起弥生陶器薄而坚固、饰纹简素、讲究实用的特点，绳纹陶器陶体较大（绳纹中期尤为明显），装饰复杂。绳纹陶器不是烧制的，而是晒制的。弥生时代接受大陆新技术以后，改用陶车、辘轳注产，且在摄氏 400 度至 800 度的低温下烧制而成，故均称为“陶土器”。低温制（粘土用高温烧制则会断裂）土器常有硬度不够且吸水的缺点。原始时代的陶器既是人们日常的实用器物，同时也是人们用于信仰及祭礼的祭品。

公元 5 世纪，大陆称为‘须惠器’^① 陶器的传入，给日本的土器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其原料改用陶土，烧制陶器须高达摄氏 1000 度到 2000 度的高温，因此质地坚硬，无透水性，烧制过程中还出现了灰釉。奈良末期，中国青瓷及上釉技术传入之后，日本才兴起了“濂户烧”，其陶器上多以樱花、菊花和巴纹等为图案，带上了日本人的审美趣味。

恩格斯曾说，人类从蒙昧阶段进入野蛮阶段，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则是野蛮时代的标志之一。绳纹末期起，日本逐步从蒙昧走向开化，走向文明。

原始宗教意识与性崇拜

在人与自然不分你我、浑然一体的远古时代，摄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人们把日月、山川、草木，乃至龟、狼、熊、猪等奉为神明，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

须惠器的来源是中国殷代的灰陶，其制作方法从中国南部经朝鲜传入日本。朝鲜的新罗烧（新罗制青灰色或青黑色陶器）大概就是须惠器的原型。